

核心提示

转眼,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了。如今,莫言还有什么梦想吗?有,当然有,他太想成为一个书法家了。这个梦想不知道燃烧他多少年了,我甚至感觉到他对这个“梦想”的期盼,超过了诺奖对他的诱惑。书法家的梦想,对莫言来说是硬功夫,它不是由评委投票决定的,而是靠自己的“字”来征服大众的。



莫言：还有一个书法梦

不打不相识的友谊

和莫言的关系,是我和诸多作家最为俏皮的一种,说俏皮是因为有故事。作为一个编辑和评论人,很多人因为我写了他们的第一篇评论,后来成为了好朋友,比如苏童、迟子建、鲁羊等。我也批评过一些作家,比如马原。马原很大度,后来还在《文学自由谈》上著文“批评的提醒”,对我的“酷评”表示认可。但我们之间的联系还是很少,莫言是一个例外,他是被我严厉“批判”之后,又成为好友的,可谓“不打不相识”。

1988年那一段时间,我非常迷恋法国新小说派和罗兰·巴特的理论,尤其是由此派生出来的“写作的零度”的理念,由此去观照当时一些走红的先锋派作家的作品,觉得他们的“自我”侵蚀文本太严重,不够“零度”。我按照这样的“零度理论”,对莫言的几篇小说《欢乐》等进行了批评,写了《反文化的失败——莫言近期小说批判》,文章在该年《读书》第十期作为头条发表以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还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背景啊?我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当时借调在《文艺报》当编辑,只是有感而发而已。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人编了一本类似“莫言批判”的集子,也收入了此文。

回到1988年,我批评莫言的文章发表

不久,我和莫言“遭遇”了。那一次我去鲁迅文学院为《文艺报》“东方金蔷薇”组稿,“东方金蔷薇”是个作家创作谈的栏目,鲁院的研究生班聚集了很多大腕,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洪峰等,都是我要组稿的对象。中午,迟子建带我到鲁院的食堂吃饭,没想到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他和迟子建一起读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合办的研究生班。我有些想回避,没想到莫言主动开口了:是王干吧,你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挺好的。大家都说王干批评你,我吓了一跳,一看文章,百分之五十一在表扬,百分之四十九批评,还是表扬为主。我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莫言如此幽默且大度,尴尬的气氛被莫言缓解了,我们就坐在一起吃饭了。

之后我和莫言就有了一些交往,但我没有刻意对莫言写过称赞性的评论。记得2005年春天,扬州方面邀请他参加笔会,他起初不愿意去,后来在我劝说下,他还是去了,并且为扬州留下了精彩的对联,比如“一江春水三省茶,两代名厨四季宴”之类,至今还挂在扬州富春茶社里。莫言写完对联,还发短信给我,将与会的作家名字嵌进对联,印象最深的是将苏童、黄蓓佳、赵本夫等名字嵌进去的妙联,让人笑喷,也领略了一代作家的才情。

如乡村少年般的浑朴

莫言迷恋上书法,是十几年前的事情。2008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参加《检察日报》社在河南云台山的一次笔会,莫言开始大显身手,凡有人要求留下墨宝,莫言当仁不让,而且来者不拒。那一天晚上,主办方让作家留下墨宝。我们一致推荐莫言,莫言那晚兴致很高,挥毫泼墨。等主人散去,莫言还在写,原来是当地一位司机,求莫言赐字。莫言写完,司机说,莫老师,你的字又大又黑,有精气神,能不能帮我岳父也写一幅?莫言又用左手写了一幅。我一看,这左手比右手写得要好,我说,能不能给我写一幅?莫言说,你要字,我回去好好给你写一幅。

回到北京不久,莫言发短信给我,说你是客气问我要字的,我写好了。给我地址,快递过去。收到莫言的墨宝,异常喜欢,他的左手书拙朴中带着稚气,像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一样,干净、单纯,带着乡村少年的浑朴。我很喜欢,用镜框装上,挂在办公室墙上。当时,我在《中华文学选刊》当主编,还邀请他为刊物题写过一年篇名,莫言在挥笔之余,意犹未尽,偶尔还写打油诗调侃我一下,用整张纸写好一并寄我,我也就“笑纳”了。

莫言对书法的痴迷就像我对围棋的迷恋一样,时时铭刻在心。这些年他在书法上下的功夫,让人感动。我们见面聊得最多的就是书法。谈帖、谈碑、谈纸、谈墨、谈笔。2019年8月25日,莫言微信说,他收到管峻送的两支笔,并说:你可跟管峻要几支他的专用笔,好使。且附了一首诗。

莫言新笔赋诗:管峻送我笔两支,首试抄赠兆言诗。工欲善事先利器,试用牛刀宰小鸡。

管峻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的院长,其书法作品典雅清新,汉风浓郁,是江苏书法界的翘楚,我最近出版的《人间食单》的书名就是他题写的。因为莫言的推荐,我也向管峻索要几支笔,而且还要他的一刀专用纸,但奇怪的是管峻的专用笔到了我手里,并没有莫言说得那么好使,反而有些不如我的老秃笔“听话”。可能两位大师的境界,我只能心向往之,笔力不够,好笔也徒叹奈何。

2019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因请莫言为“王干书屋”题字,去他北师大的工作室取字。莫言说:书法的生命在于变。因为变,才有今天的书法艺术,墨守成规是没法前进的。莫言对书法之痴情令人难忘,他回忆在中国台湾访问时,正值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颜真卿原作还对外开放,他在《祭侄稿》面前沉吟揣摩了三天。他认为,文人书法是书法的正宗,源头,一切书法的法度都因文人而制定。他说,现在很多作家贾平凹、李敬泽、王祥夫、王跃文、程绍武、徐则臣、熊召政、欧阳江河、南帆、谢有顺、陈应松等热爱书法,有的写得很有特点。他和我说:“你们南京的金陵四老(林散之、高二适、萧娴、胡小石)都是文人,健在的尉天池也是中文系老师出身,所以是大家。文人书法不能边缘化,要加油。”

能点亮生活的梦想之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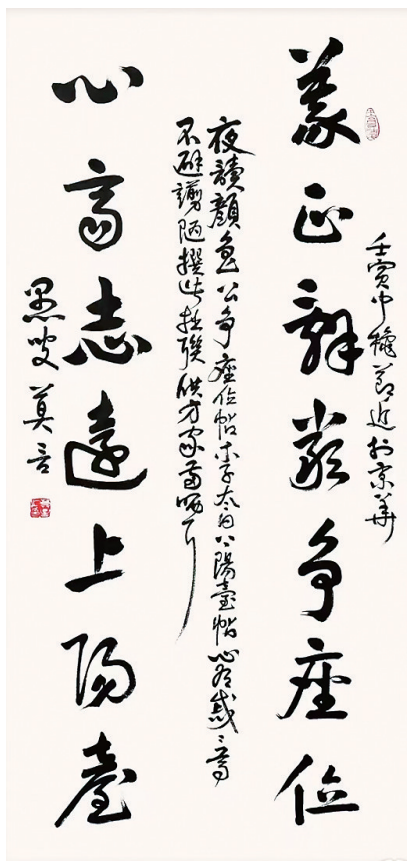
那天,正好莫言书桌上一张写着“槐花如雪”四个字的废纸莫言准备用来润墨,我

一看,挺好,就说,“我收了,是‘六一’写的吧,稚气,拙趣”。他一看有点舍不得,说,不错啊,还拍照留了个念。当然字就给了我。在我看来,莫言的长卷最好,他在作品中那股磅礴气势和首尾相连的格局,很多文人难以企及,就是很多的书家也不逮。

莫言的书法在网上也遭遇到一些网民的“酷评”,一些人讥笑为“丑书”,一些人出言不逊,这里面有些是出于审美价值观的不同,有些则是起哄,名人被消费是网络上的流量热点。莫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赶紧出来解释说,我写字只是爱好,不能算书法。但莫言并没有放弃他的书法梦,在各种议论的热潮之后,莫言没有因为网上的言论而停止他追寻梦想的脚步。他更加坚定地坐在笔墨宣纸之间徜徉,沉醉于古人和今人的书界天地。出于他对颜真卿的膜拜和追求,在他的笔下也慢慢显现出莫氏的颜体风味。为了和读者和网民沟通,他和王振两人创办了公众号“两块砖墨讯”,及时记录自己学书进程中的点点滴滴。他和王振两人自驾出游,在祖国的大山名川里寻找灵感,留下了很多的诗词歌赋,也留下很多的书法作品。这有点类似古代文人李白等的“仗剑出游”,岂不快哉?同时莫言的书法也越来越得到业内的认可。2022年莫言成立了一个慈善项目,专项用于救助中西部省区困难家庭先心病儿童。首批得到救助的甘肃和西藏的29名先心病儿童,善款就源于莫言捐出的书法作品。

每个人都有梦想,莫言的书法家梦想是无数普通中国人诸多梦想中的一个,因为有梦想的光,生活的幽暗处才会被照亮。莫言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想照亮别人。

据《新民晚报》 王干/文



历史

秦胜,又综合南北文化,建一大帝国。“此文虽仅寥寥二十余页,颇耐深思”。

李济对毕士博的这种中国新石器文化完全来源于西方的观点当然不能认同。他在1954年1月11日纪念蔡元培先生八十七诞辰会上的学术讲演中说:“中国文化之常常接受外国文化,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能接受才能发展。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文化的内容全是外来的,则它在世界的文化史上,却也不能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李济说,毕士博用家畜为例,是一个很不幸的例子。毕士博立论的根据,是1933年以前安特生所作一般性的说明,这种根据甚为薄弱。而山东城子崖发掘

出来的兽骨,都是经过专门的鉴定的,其中不但有牛、羊,而且有马。最足以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有牛的,是城子崖下层出土的占卜所用的牛肩胛骨。在毕士博文章发表的前后,史语所考古组曾送请德日进和杨钟健两位鉴定,鉴定的结果证明不但有牛有羊,在安阳附近还有很多的水牛和新种的股羊;这种水牛和股羊,已有古生物标本证明,完全是在华北完成其豢养的。

关于“麦子”是不是由中国之外传来的,李济认为毕士博可能是对的。因为甲骨文里的“麦”字就是“来”字,证明麦子是外来的;但当时中国人是吃稻子还是吃小米的,是不容易解决的,仰韶时期已有稻子发现,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

中国的小米历史还不能说定。针对毕士博《远东文化之原始》一文中的说法,李济更是举了任何有偏见的科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的完全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三个东西来进行反驳:这三个东西一是一骨卜,二是蚕丝,三是股代的装饰艺术。

第一件,李济举出的是骨卜的例子。

山西经济出版社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这也是《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能够受到观众喜爱、传唱至今的原因吧。这首经典歌曲悠扬自然,流畅舒坦,沁人心脾。在这动听的歌声中,荡漾着对人民领袖至亲至切的热爱之情与无限景仰,浸透着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念。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爬上飞驰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哎嗨……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创作于1956年,是故事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这首经典作品由新四军战士、著名诗人芦芒作词,同是新四军战士的著名音乐家吕其明谱曲。故事片《铁道游击队》反映了抗战时期,活跃在山东枣庄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历程。吕其明运用山东民歌中富有典型意义的音调创作了这首颇有浓厚地方色彩的乐曲,表现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中顽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在全国传唱半个多世纪仍旧广受好评。

连载